



文化构建
与
宋代文士及文学

崔际银 著



文化构建

与

宋代文士及文学

崔际银

著

宋文士与文治早已有之

宋人重文

读书人入朝廷

朝廷重用出仕者大

(朝廷重用士人，重视科举考试)

唐宋八大家之说

唐宋八大家之说

唐宋八大家之说

唐宋八大家之说

宋词四大家：苏轼、辛弃疾、柳永、欧阳修

苏轼为“豪放派”代表，辛弃疾为“豪放派”代表

宋词四大家：苏轼、辛弃疾、柳永、欧阳修

苏轼为“豪放派”代表，辛弃疾为“豪放派”代表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 数据

文化构建与宋代文士及文学 / 崔际银著. — 天津：
天津古籍出版社, 2011.9

ISBN 978-7-80696-929-8

I . ①文… II . ①崔… III . ①文化史—研究—中国—
宋代②中国文学—古典文学研究—宋代 IV . ①
K244. 03②I206. 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183109号

文化构建与宋代文士及文学

崔际银 / 著
出版人 / 刘文君

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
(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)

<http://www.tjabc.net>
E-mail:tjgj@tjabc.net

三河市富华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2.125 字数 320 千字

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80696-929-8

定价: 40.00 元

· 目 录 ·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导言 | 1 |
| 一 文化与文化精神 | 1 |
| 二 文学与民族文化精神 | 4 |
| 三 宋代文士与民族文化精神承传建构..... | 10 |
| 第一章 宋代社会文化处境 | 13 |
| 第一节 宋代域内社会文化现状 | 14 |
| 一 皇权不固..... | 14 |
| (一)政权获取方式可疑 | 14 |
| (二)纲纪长期废弛 | 17 |
| 二 奢靡成风..... | 20 |
| (一)朝廷鼓励享乐 | 21 |
| (二)官民追求奢华 | 22 |
| 三 南北差异..... | 24 |
| (一)南北文化的异质表征 | 24 |
| (二)南北文化的竞争互动 | 26 |
| 四 积贫积弱..... | 28 |
| (一)百姓生活贫困 | 28 |
| (二)国家实力软弱 | 30 |
| 第二节 宋代外部文化压力 | 32 |
| 一 外部压力的形成及表现..... | 32 |
| (一)外部压力的生成 | 32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(二)外部压力主要表现 | 34 |
| 二 外部压力的作用..... | 37 |
| (一)限制宋朝整体发展 | 37 |
| (二)影响宋朝内外政策 | 39 |
| 第三节 宋代文化政策选择 | 40 |
| 一 抑武..... | 40 |
| (一)直接解除将帅兵权 | 41 |
| (二)创设新制掌管军队 | 44 |
| (三)严厉打击违规军人 | 45 |
| 二 重文..... | 47 |
| (一)“重文”的基本举措 | 47 |
| (二)“重文”的政治蕴意 | 48 |
| 三 妥协退避..... | 50 |
| (一)退守情绪弥漫 | 50 |
| (二)妥协成为必然 | 52 |
| 第二章 宋代文士的文化任务 | 54 |
| 第一节 承接唐五代文化遗产 | 54 |
| 一 辉赫的“盛唐”文化成就 | 55 |
| (一)综合国力极其强大 | 55 |
| (二)文化环境开放多元 | 56 |
| (三)精神风貌积极昂扬 | 59 |
| (四)文化成果色彩纷呈 | 60 |
| 二 待解的“乱世”遗存难题 | 62 |
| (一)藩镇冲击社会结构 | 63 |
| (二)观念系统遭遇重创 | 67 |
| (三)文士生存陷入困境 | 72 |
| 第二节 应对现实社会文化需求 | 73 |
| 一 重建社会文化秩序..... | 74 |
| (一)制定礼仪程式 | 74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(二)强化军政管理 | 75 |
| (三)完善司法制度 | 77 |
| 二 巩固强化主干文化根基..... | 79 |
| (一)推崇儒家思想 | 79 |
| (二)倡导封建伦理道德 | 81 |
| 三 展示文士自身文化素养..... | 82 |
| (一)以知识为用 | 82 |
| (二)借品格立身 | 83 |
| 第三节 开拓创新文学领域 | 86 |
| 一 理念创新..... | 86 |
| (一)平易自然 | 86 |
| (二)注重理趣 | 89 |
| (三)化俗为雅 | 90 |
| 二 文体创新..... | 92 |
| (一)以文为诗 | 93 |
| (二)以诗为词 | 94 |
| (三)以赋为文 | 95 |
| 三 方法创新..... | 97 |
| (一)诗法 | 98 |
| (二)词法 | 99 |
| (三)文法 | 101 |
| 第三章 宋代文士关注的文化命题 | 104 |
| 第一节 道统重建:儒学与释道 | 104 |
| 一 “道统”重建的困境与定策 | 105 |
| (一)重建“道统”之困 | 105 |
| (二)官方重建方针 | 106 |
| 二 “道统”建设的历程 | 110 |
| (一)儒士的“卫道” | 110 |
| (二)佛教与道教的微调 | 112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二节 人格区分:君子与小人 | 115 |
| 一 重塑君子人格 | 116 |
| (一)贬抑人格损污之士 | 116 |
| (二)大兴君子之风 | 119 |
| 二 “朋党”氛围中的人格区划 | 121 |
| (一)宋代“朋党”基本状况 | 122 |
| (二)评论“朋党”的主要观点 | 126 |
| 三 人格论争的效应 | 130 |
| (一)正面效应 | 131 |
| (二)负面影响 | 133 |
| 第三节 政治改革:骤变与渐变 | 135 |
| 一 宋代政治改革的社会基础 | 135 |
| (一)国力不堪重负 | 136 |
| (二)享国日久而诸事因循 | 138 |
| (三)文人士子热衷参政 | 140 |
| 二 骤变:熙宁变法 | 141 |
| (一)选择骤变方式的必然性 | 142 |
| (二)熙宁变法的具体实施 | 143 |
| (三)变法成效及评价 | 147 |
| 三 渐变:苏轼的治国理念 | 149 |
| (一)渐变的基本主张 | 150 |
| (二)坚持渐变的遭遇 | 152 |
| 第四节 对外关系:战与和 | 155 |
| 一 厌战:国人的普遍心理 | 155 |
| (一)皇帝厌战 | 155 |
| (二)将帅厌战 | 157 |
| (三)民众厌战 | 160 |
| 二 主战:社会精英的艰难选择 | 161 |
| (一)朝臣维护国体 | 161 |
| (二)文士激励斗志 | 164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三 和议:朝廷的基本国策 | 165 |
| (一)宋朝和议特征 | 165 |
| (二)宋朝议和缘由 | 168 |
| 第五节 学术思想:主经世与倡性理 | 172 |
| 一 经世事功的理论与实践 | 173 |
| (一)探讨富强路径 | 173 |
| (二)弘扬事功主张 | 177 |
| 二 修性明理的体系构成 | 184 |
| (一)世界本原:太极即理 | 184 |
| (二)道德结构:理一分殊 | 185 |
| (三)立身法则:存理灭欲 | 187 |
| (四)进修方式:格物穷理 | 188 |
| 三 宋代学术特征 | 190 |
| (一)轻章句而重义理 | 191 |
| (二)主儒学而融百家 | 194 |
| (三)遵规矩而倡活法 | 196 |
| (四)师传统而求创新 | 199 |
| 第四章 宋代文学展示文化精神之轨迹 | 205 |
| 第一节 北宋初期:人生状况的表述 | 205 |
| 一 入宋士子婉转怀旧 | 206 |
| (一)假借史传怀念往昔 | 206 |
| (二)模仿唐人创作诗文 | 207 |
| 二 服膺新朝者歌功颂德 | 210 |
| (一)降臣表达归顺意愿 | 210 |
| (二)受宠新贵真心颂扬 | 211 |
| 三 重文氛围中疏放身心 | 213 |
| (一)老臣适性而为 | 213 |
| (二)少壮风度翩然 | 215 |
| 第二节 北宋中期:改革社会的探索实践 | 217 |

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 | 范仲淹:道德家推行新政 | 217 |
| (一) | 庆历新政半途而废 | 218 |
| (二) | 道德风范长存于世 | 219 |
| 二 | 欧阳修:文学家诗文革新 | 220 |
| (一) | 欧阳修时代文学状况 | 220 |
| (二) | 诗文革新成功的基本保障 | 223 |
| 三 | 王安石:政治家着意变法 | 225 |
| (一) | 表达从政志向 | 225 |
| (二) | 申明变法主张 | 227 |
| 第三节 | 北宋后期:思考解读生存困境 | 229 |
| 一 | 苏轼:旷达处世 | 230 |
| (一) | 多舛人生经历的磨炼 | 230 |
| (二) | 多种思想观念的支撑 | 232 |
| (三) | 多样艺术才能的彰显 | 233 |
| 二 | 黄庭坚:诗艺寄托 | 235 |
| (一) | 政治负累常伴 | 235 |
| (二) | 诗艺承载甘苦 | 236 |
| 三 | 周邦彦:享受红尘 | 238 |
| (一) | 文才博取声名 | 238 |
| (二) | 赋词享乐人生 | 240 |
| 第四节 | 南宋前期:救亡与恢复的巨大努力 | 242 |
| 一 | 遭遇巨变之苦难倾诉 | 242 |
| (一) | 乱世女性凄楚 | 243 |
| (二) | 文弱士人心态 | 244 |
| 二 | 抗敌复国的坚定誓愿 | 246 |
| (一) | 爱国将相身体力行 | 246 |
| (二) | 文坛精英大声疾呼 | 248 |
| 三 | 壮志难酬的悲愤情怀 | 251 |
| (一) | “归正人”难言之痛 | 251 |
| (二) | 背时者无奈感叹 | 255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五节 南宋后期：推崇儒学精神与追求清雅品格 | 257 |
| 一 朱熹：高扬儒学性理 | 258 |
| (一)理学家的创作理论 | 258 |
| (二)贯穿性理的创作实践 | 261 |
| 二 姜夔：展示清雅品格 | 265 |
| (一)高洁人生定位 | 266 |
| (二)“清空”“骚雅”词品 | 267 |
| 三 “四灵”：放情田园山水 | 269 |
| (一)崇尚野逸清幽格调 | 269 |
| (二)安顿衰世文人心灵 | 272 |
| 第五节 宋末：爱国情感迸发与遗民情结表现 | 273 |
| 一 靖难赴死彰显忠义 | 274 |
| (一)展示爱国忠诚 | 274 |
| (二)践行民族大义 | 275 |
| 二 保持气节怀念故国 | 277 |
| (一)记述亡国之痛 | 277 |
| (二)长怀故国之思 | 280 |
| 第五章 宋代文士致力文化精神构建探原 | 284 |
| 第一节 文化传统惯性推动 | 284 |
| 一 维护农耕文化基础 | 285 |
| (一)中华农耕文化构成要素 | 285 |
| (二)宋朝维护民族文化之努力 | 286 |
| 二 强调“夷”“夏”之辨 | 288 |
| (一)秉承“尊王攘夷”思想 | 289 |
| (二)“攘夷”方式的艰难抉择 | 291 |
| 三 崇奉“大一统”观念 | 293 |
| (一)“大一统”观念之定型 | 294 |
| (二)宋代对“大一统”之体认 | 297 |
| 第二节 理学思想掺入 | 302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 宋代理学基本状况 | 303 |
| (一)宋代理学的形成 | 303 |
| (二)宋代理学发展述要 | 306 |
| 二 宋代理学现实作用 | 314 |
| (一)创新并确立儒学正统地位 | 314 |
| (二)塑造文士形象 | 316 |
| (三)引导大众价值观念 | 321 |
| 第三节 优待文士之厚报 | 323 |
| 一 尊重文士人格 | 323 |
| (一)维护师道尊严 | 324 |
| (二)彰显文士声名 | 326 |
| 二 发挥文士作用 | 329 |
| (一)与君王共治天下 | 329 |
| (二)承传文化统绪 | 331 |
| 三 宽松文士生存环境 | 335 |
| (一)宥贷文士过错 | 335 |
| (二)提供良好条件 | 338 |
| 余论：宋代文士弘扬民族文化精神之意义 | 341 |
| 一 完善文化体系 提供示范导向 | 341 |
| 二 精心结撰著述 推动文化传播 | 346 |
| 三 丰富文化蕴涵 发挥巨大作用 | 349 |
| 主要参考文献 | 357 |
| 后记 | 375 |

导　　言

文学，是以语言塑造形象、反映现实的艺术。文学从属于文化，具体而言，是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。精神文化是文化成果中最为重要的部分，其精髓就是文化精神。文学创作一方面遵循着文化精神，另一方面则对文化精神发挥着充实与完善的作用。文士，是文学创作的主体，也是文化创造与传播的核心力量。

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。各个时代的文学作品，不仅记载该历史时期的现实状况，而且反映当时的时代精神。虽然每一时代的文学都具备这一特征，但是宋代以其特殊历史际遇，成为文学表现民族文化精神最鲜明的时代之一。将宋代作为研究对象，探讨文士、文学与文化精神构建之间的关系，具有典型意义。在进入具体研讨之前，对文化与文化精神、文学与文化精神、文士与文化构建等相互关系予以梳理，是很有必要的。

一　文化与文化精神

文化，是伴随着人类产生而形成、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（区别于普通动物，逐步脱离蒙昧）的产物。按照历史学、考古学的观点，人类初期的文化发展是在“石器时代”，包括“旧石器时代”和“新石器时代”。旧石器时代距今约二百五十万年至距今一万余年。旧石器时代一般



划分为早期、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，分别相当于人类体质进化的能人和直立人阶段、早期智人阶段、晚期智人阶段。新石器时代约始于一万八千年前，结束时间大体在距今五千年至两万年之间（因人类群体居住地域、发展程度不同）。旧石器时代以使用打制石器为标志，主要用来满足采集果实、进行渔猎的需求。新石器时代以使用磨制石器为标志，人类开始从事农业和畜牧业，食物的来源变得更加稳定而充裕，完全依赖大自然提供食物的状况得到改变。新石器时代的物质生活得到明显改善，使人类具有发展文化事业的能力，为此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奠定了基础。

在距今五千年至四千年期间相继出现了古埃及（公元前 3500 年）、古巴比伦（公元前 3500 年）、古印度（公元前 2000 年）、古中国（公元前 2000 年）世界“四大文明发源地”，亦称“四大文明古国”^①。它们有着相似的特征：一是地域靠近江河（尼罗河、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、印度河与恒河、长江与黄河）；二是形成社会阶层（统治者：王室、僧侣、奴隶主、贵族；被统治者：自由民、平民、贱民、奴隶）；三是出现文字（象形文字、楔形文字、梵文、甲骨文）；四是制定历法（太阳历、太阴历、夏小历）；五是创造了数学计算方式（计算面积、六十进位法、阿拉伯数字、十进制）。这几个方面的特征，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，也为后世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。

人类文化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上述阶段，但人们对文化的理性体认，在时间上则远为滞后。汉语中的“文化”一词，最早出现在西汉。西汉著名学者刘向有言：“圣人之治天下也，先文德而后武力。凡武之兴，为不服也，文化不改，然后加诛。夫下愚不移，纯德之所不能化，而后武力加焉。”^②其中的“文化”与“武力”相对应，含义是“以文教化”，即运用伦理道德教育感化世人。在整个中国古代，人们对“文化”意义的认识大体未出“以文教化”的视阈范围。

^① 目前国际学术界公认的古代文明发源地有五个（另加古希腊）。但古希腊约形成于公元前 800 年，时间晚于上述四大古国，故此处不述。

^② 《说苑》卷一五《指武》，见《百子全书》，第 205 页，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。



文化,作为一切劳动成果的总和,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涵。将文化视为重要理论命题进行深入研究,始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。我国对文化的真正研究起步于近代,当时一批著名学者如梁启超、蔡元培、梁漱溟、陈独秀、冯友兰等,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。他们大多既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,又吸收了域外文化观念的因子,其结论均具有一定影响力^①。但是,由于众多学者的国别、视角、目的、学养、方法等等的不同,对文化的认识可谓千差万别。据不完全统计,迄今关于“文化”的定义就有 200 多个,而且还有新的定义出现。可见,要对“文化”作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,是十分困难的事情。当然,人们对文化也不是全无共识。例如:文化就是人化(经过人的加工),包括人类的所有劳动成果;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、制度文化、精神文化等类别;文化可分为“广义文化”和“狭义文化”,“广义文化”即指人类劳动成果总和,“狭义文化”特指人类创造的“精神文化”。这些观点,受到多数学者及文化爱好者的认可,完全可以作为体认、研究文化的基本依托。我们认同“文化即人化、文明化”的观点,拟采用“广义文化”、“狭义文化”等标准对文化予以分类,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关阐析。

文化产生的初始动力主要是基于改善生存条件。这种着眼于物质的文化活动(如伐木造屋、采石狩猎),既受到活动主体(劳动者本人)意识的指导,是其思维活动的具体展现,又可以将这些文化活动的过程记忆于自己大脑之中,同时还可以引发他人的注意、模仿乃至后世的承传。这些,都属于精神的范畴。那么,什么是文化的基本精神呢?张岱年先生认为:“文化的基本精神,就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精微的内在动力,也即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。这种能够作为文化发展内在动力的基本思想,本身也是文化发展的产物,并随文化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。因此,文化的基本思想,同时也一定是文化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的中心思想,是文化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基本观点。要而言之,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一定文化创造出来的并成为该文

^① 参见吴存浩《中国文化史略》,第 3—4 页,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4 年。



化的思想基础的东西。”^①可见，“文化精神”（亦可称为“文化思想”）既是从事文化活动的指导思想（内在动力），对文化活动具有引发、激励或制约等作用，又属于文化形态之一（精神文化）；既具有个体性（个人的文化追求、文化品格），又具有团体性（包括某一阶层或某一国家民族），而具有团体性（为公众认同）的文化精神更加重要；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，又具有变化性（随文化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）。其中，能够作为文化发展内在动力、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、获得社会大众认同、发挥凝聚人心与激励斗志的作用，是“文化精神”的主要特征。“文化精神”的形成，是一个动态的历时性过程。它被承载于“传统”之中，又在承传之中不断充实、完善。因此，人们通常所说的“传统观念”、“传统思想”，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“文化精神”。

二 文学与民族文化精神

文学是文化的分支之一，与文化精神同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。从理论上讲，文学创作与文化精神都具有“普世性”，它们适用于世界所有的国家和民族，甚至各民族在文化与文学方面关注的重点、表述的方式等等都有相同之处。但是，文化思想的差异是十分巨大的，例如，对“平等、自由、人道、尊严”等的认识，不同国家民族有着各自的理解。文学与文化一样，都具有鲜明的民族性。选取“民族性”的视角探讨文学与文化精神的关系，比之从“普世”的角度认知双方关系，更加具象和真切。

“民族文化精神”（民族精神），是民族文化精髓的体现。民族文化，是区分文化类别的基本方式。某一民族所包含的文化形式、文化思想观念，往往是超越时代、地域、阶级甚至国家的，之所以如此，主要是缘于“民族文化精神”的巨大作用。民族精神的形成，是一个历时性、传统化的过程。在这一过程中保存下来的民族文化因子，汇集成本民族的传统文化。一个民族的历史愈悠久，其传统文化也就愈益厚重鲜明，最能显示该民族传统文化特征的思想观念就是其“民族文化

^① 张岱年《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》，第18页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。

精神”。

我们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,创造了极其灿烂的文化,形成了内含丰富、影响深远的文化传统。中华民族并非单一民族,而是由汉族等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组成。经过几千年的民族融合,各兄弟民族共同造就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传统文化。因此,中国传统文化是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,是中华民族大家庭集体智慧的结晶。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,虽然经历了无数的内忧外患,但中华传统文化、中华文化精神始终指导、激励着华夏儿女,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中华文化的核心,是以儒家思想为主、融汇吸收各家思想和外来思想文化,进而形成的体现中华民族主体意识的思想体系。按照张岱年先生的意见,这一思想体系的“要素主要有四:(1)刚健有为;(2)和与中;(3)崇德利用;(4)天人协调。其中天人协调思想主要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;崇德利用思想主要解决人自身的关系即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关系;和与中的思想主要解决人与人的关系,包括民族关系、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等人伦关系;而刚健有为思想则是处理各种关系的人生总原则。四者以刚健有为思想为纲,形成中国文化基本思想的体系”^①。与张先生“以刚健有为思想为纲”不同,梁漱溟先生认为:中国文化“是以意欲自为调和、持中为其根本精神”,重在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问题。这种“调和持中”,也是与西方文化“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”(人与自然的物质关系)、印度文化“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”(人与自身的精神关系)之间的最大区别之处^②。张、梁二位先生所论,都是中华文化的本质特征所在,其中蕴涵着鲜明的民族文化精神。在此,我们对学术界的相关意见稍作整合,拟将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主要特征归纳如是:

其一,遵从天道,崇尚人文。“天道”,亦即大自然、自然及社会发展规律;“人文”,就是人情、人事(人间之事)及礼乐教化。“天道”与

① 张岱年《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》,第19页,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。

② 梁漱溟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,第33、63页,商务印书馆2009年。



“人文”的关系，就是“天人关系”。对于大自然及其各种变化（天道），中国文化表现为遵从（春夏秋冬季节变化）、敬畏（地震、雷电）、感激（春风、甘霖）的态度，与大自然保持亲密和睦的关系，视天地为“万物父母”、人类是“万物之灵”^①。这与“战胜自然”（如欧美各国）或“超越自然”（如印度、希伯来）的文化类型有着很大的不同。中国文化的“人文精神”是一种以人为本、重视人生的思想理念，在这种理念指导下，人的地位十分尊崇，甚至达到了与天地比肩的位置：“立天之道，曰阴与阳；立地之道，曰柔与刚；立人之道，曰仁与义；兼三才而两之，故《易》六通而成卦。”^②《周易》将天、地、人并称为“三才”，消除了人与自然之间的隔膜，培育了中华民族乐于与天地合一、与自然和谐的精神，达到了人与天同、人天相通、天人合一的境地。由于“天道”中既指自然变化又包含着社会发展规律，“人文”则由此生发出“礼乐教化”的含义。礼乐教化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情操，因此，道德的培育成为“人文”的重要内容。可见，中华文化的“重人”要点并非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人的自由发展，而是将个体融入群体，强调个人对宗族和国家的义务，同时也会得到相应的关爱与保护。这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主张思想自由、个性解放、反对宗教束缚和经院哲学的“人文主义”有着很大区别。持平而论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“人文主义”思潮是反抗中世纪宗教血腥统治的结果。中国在此前早就进入封建社会，“民为贵”（孟子语）思想深入人心且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施行，中国百姓与欧洲中世纪及以前的奴隶时代民众相比，受压迫的程度要低得多。因此，中国的封建社会比之欧洲也延伸得更加长久。

其二，疏远虚幻，注重实际。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务实的民族，这种务实品格的形成，在于源远流长的农耕经济。先民们在生产实践中深深体会到：不劳动则不能得食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。因此，以农业为

^① 《尚书·泰誓上》：“惟天地万物父母，惟人万物之灵。”见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181页，中华书局1980年。

^② 《周易·说卦》，见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93—94页，中华书局1980年。